

# 边界缓冲区 :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关丙胜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当由原初自然生态环境所营造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 ,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在漫长的历史场域中 ,因族群势力的时强时弱就会在边界之间形成你来我往的边界缓冲区。无数历史实践证明 ,边界缓冲区往往是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关键词 :**边界缓冲区 ;新族群 ;族群边界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9)01-0026-05

## Buffer Zone on the Borderlands: A Hotbed for Emergence of New Ethnic Groups

GUAN Bing-sheng

**Abstract:** Whe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at were previously built by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broken through along with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m, the expansions of borderlands to occupy more natural resources must lead previously distant ethnic groups to conflicts as a result of these expansion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owns and ups of ethnic forces with time, buffer zones on the borderlands where ethnic groups contact one another have taken shape. It has been proved by history that buffer zones on the borderlands always serve as a hotbed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Buffer zones on the borderlands, new ethnic groups, ethnic boundaries

### 一、问题的提出

边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自然和文化形态的普遍现象。在人类处于发展初期的古代 ,人类的生存选择主要是对周边环境的适应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首要的 ,也是决定性的。在这种自然生态唯上的发展阶段 ,环境决定了一切。“他们(族群)在自然环境中明显地占据了独特的小生态环境 ,在最低程度的竞争中占有生态资源。”<sup>[1]</sup>因而 ,在古代 ,族群之间的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 ,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这种最初的自然生态边界也就造就了随之形成的族群之间的地理边界。地理边界相对于自然生态边界来说 ,更具有扩展性和延展性。即地理边界大大地扩充了自然生态边界 ,如果自然生态边界只是某个族群勃发的一个中心的话 ,那么 ,随着族群

本身的发展和其对这个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 ,族群必将把自己的活动领地延伸到类似的自然生态区域之内 ,从而将自己的活动边界向能够适应的区域外推 ,直到边界的边缘和自己边界内的生态环境差别太大而无法适应为止。“文化优势理论认为 ,一种文化的发展 ,必须有对更大范围里各类环境的更强的适应能力 ,并对这些环境中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利用水平 ;那些在既定环境中能够更有效地开发能源资源的文化系统 ,将对落后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扩张。”<sup>[2]</sup>本质上 ,地理边界是扩大了的自然生态边界。但复杂的人类发展事实是 ,当族群在一定的自然生态边界上形成稳定的发展共同体之后 ,往往会突破这种生态环境决定的边界 ,而向周边可能的地方重新营造边界。此时 ,自然生态的适应与否已经不再是族群首先面对的问题 ,因为人类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物

收稿日期 2008-12-03

作者简介 :关丙胜(1974- ) 男 ,藏族 ,青海湟中人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青海大学 副教授 ,主要从事移民族群研究。

质基础以保证其对生态边界的跨越。当由某个小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产生的族群发展壮大之后,尤其是创造了各种文明之后(当然包括社会组织、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等),族群的边界显然已经不是地理边界能决定了的。文化、政治以及其他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族群跨越边界的工具,也自然有可能重新划定族群边界的标志。但这一切,并不可能把地理边界排除在族群边界的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存在的地理边界,往往通过漫长的族群心理沉淀,成为文化边界的一部分,也成为一个族群维持其边界的重要屏障。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这些地理边界大多成为国家疆界。

同时,族群之间的边界往往是不清晰的,或者,在一些边界上往往存在着一个缓冲区。如果对于地理边界来说这种现象还不是非常明显的话,那么,在文化或者族群的边界上,缓冲区的存在是常见的。它的产生,要么是族群冲突的结果,要么是强大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总之,族群边界之间缓冲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历史实践证明,族群边界之间的缓冲区往往是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 二、实例 汉藏边界缓冲区内的多民族格局

### (一)汉藏边界之间生态与文化的弧形锋线

如在汉藏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缓冲区。这个巨大区域的存在,使它自古至今演绎着塑造众多族群的神话。藏汉边界的地理分界线大致是:西北起自阿尔金山,向东南沿着祁连山一直南下,到积石山,再沿着甘青边界、川青边界到川西高原,并最终到达云南梅里雪山一线。这一分界线,如果在地图上描出,就会形成一个起自敦煌以南,开始向东,再向南,最后向西南的美丽弧线。它的直观分界线就是青藏高原的东北、东和东南边缘。在这一美丽的弧形锋线以西,是具有独特地貌特征的高原草原地区,是典型的高山牧场,自古以来就是良好的天然草原,不适于农业耕作。从文化特征来看,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区。在弧形锋线以北、以东,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以及山地丘陵地区,这些地区很早就有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西边放牧东边种粮”是对这一锋线两边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种地理边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显而易见,因而也造就了锋线两边民族分格迥异的文化传统。史料表明,最迟在唐代前期,锋线以西

是吐蕃族、以东是汉族的民族大格局就已经形成,并延至今日。也就是说,这种民族的边界已经维持了长达1300多年。在这长期的边界维持中,生态的边界常常被打破,而文化的边界时时你来我往,从而形成了一个边界的游弋现象,即:某些时候这个边界向西移动,有些时候却向东倾斜。尤其是在民族对垒,国家征战的特殊时期,边界常常被跨越,从而造就了政治的边界,或者叫做国家的疆界。然而,这种边界的游弋是不稳定的,是随时变化的。正因如此,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统治的缓冲地带,也就导致了其他民族在这一地带的形成和发展。

### (二)汉藏边界缓冲区的基本特征

考察汉藏边界这一美丽的弧形锋线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所具有的生态和文化的界碑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特殊的地形与地理环境是造成汉藏地理边界的直接原因。地形特征上,自西向东南延伸1500多公里的祁连山是天然的分界线。祁连山以北,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在茫茫隔壁上点缀着片片绿洲,人类很早就在此耕作繁衍。祁连山以南以西,是广阔的草原,只能放牧不宜耕种。更为重要的是,祁连山山峰高耸林立,大多数山峰海拔在5000米以上。无法轻易翻越祁连山,实质上也就无法逾越这种农牧的界限。在甘南草原、川西高原,地形也都与此相仿,高大山脉成为阻隔农牧跨越的天然屏障。

2. 地理边界是在藏汉两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才起到了显著作用的。汉藏两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民族边界似乎并没有因为地理边界的存在而泾渭分明。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都清晰表明,在从昆仑山以东,祁连山以南,一直到秦岭地区以西的广大地区内,羌人以部落的形式广为散布,长期以来是这个地区游牧的主人。尽管羌人从来没有建立有效的统一政权和国家,但部落联盟式的政治联盟始终存在。这种情况,从距今约4000年前至2000年前一直延续在青藏高原东部和黄土高原的西中部。羌人自由迁徙于这一广大地区,并没有因上述地理边界的存在而囿于狭小的地理空间之中。当然,羌人之内是有详细的支系划分的,不同支系的羌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域之内,但总体上没有严格受到地理边界的限制。直到秦帝国建立之后,随着汉民族共同体的逐渐形成,尤其是随着汉帝国的建立,在其“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sup>[3]</sup>的政

策之下,羌人一步步西退。随着护羌校尉和金城属国的设置,汉文化开始了在河湟地区的有效传播。“护羌校尉与金城属国的设置,是汉羌民族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即河湟地区羌胡各部落纳入西汉中央王朝疆域内的政治表现,也是西汉中央政权对甘青羌人地区行使有效管辖的开始”。<sup>[4]</sup>唐初,吐蕃兴起,藏族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向青藏高原周边各地连年用兵,以扩展统治区域。河湟地区也因此纳入吐蕃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随即成为藏文化的传播区域。也就是从唐蕃对垒的时候起,汉藏之间才真正开始了明确的地理边界划分。在河湟地区,这个分界线划在了“赤岭”之地(今日月山)。这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天然分界线。从此,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地理边界才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真正的民族边界。

3. 国家政权对地理边界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秦以前诸羌是可以也能够自由跨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天然屏障,到秦、汉帝国前期,羌汉之间的地理边界还是一种模糊确认的话,那么到汉代中后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此时,羌族毕竟有着一种初级的政权形式存在:部落联盟。汉帝国的国家政权形式已经非常发达,羌、汉之间的对垒大体上是以汉政权的进攻为主的。这种两个民族群体政权形式的存在,初步划分了两族的地理边界。到吐谷浑时期,由于这个草原王国的兴盛以及政权体系的完备,在它可以和中原王朝平等对话的时代,两族间的边界开始清晰。但因为吐谷浑王国兴盛期恰好是中原王朝四分五裂之时,所以这种边界的确认由于缺少了另一方强大政权的存在而不具有实际的意义。这样,到吐蕃和唐王朝时期,两个政权的空前强大和对垒,才使两个民族对国家地理边界的明晰确认成为可能,也即:两个强大国家政权的存在,是“唐蕃界碑”产生的真正条件。

4. 文化和生态边界在后期都被汉藏两族交互推移。藏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单确立了一个以游牧为主,以青藏高原为根基的吐蕃政权的存在,也预示了一个大民族文化认同的传播与开始。在汉代已经开始驻军屯田的青海河湟地区,羌族的西退,汉族的进驻与农业开发,使这一地区俨然如内地汉地一般。也就是说,此时的汉族,已经大大突破了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边界而向西推移了原有的界线。吐谷浑时期,这种边界时西时东,不断变化。到唐蕃时期,河湟地区在吐蕃的统

治之下,也即藏族大大地向东推移了边界。此时,河湟地区的汉族也基本上被藏化,成为藏族的一部分。“藏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它不仅统一过青藏高原,而且北面到达帕米尔高原,占领过新疆南部,东面到达过唐代的首都长安和四川的成都平原,南面在滇北和当时的南诏国对峙。在他们的强大时期,当地各民族人民受到他们的控制。这些人也就称为藏人”。<sup>[5]</sup>这种随着政权势力的强盛与式微,使得汉藏两族的文化和生态边界交互推移的形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所以说,汉藏文化和生态的边界到唐以后,处在一种时东时西的你来我往状态。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地带的美丽弧形锋线,是几千年来高山草原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生态边界,也是一千多年以来汉藏民族的文化和生态边界。在长期的民族发展和政权更替过程中,这个边界始终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以地理边界为中心线,是游弋的,是有一个缓冲区存在的。正是这个汉藏边界缓冲区的存在,使得藏族政权和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从战略防卫的构想出发,在汉藏边界上安排了一系列驻军和特殊群体,从而催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产生,也最终造就了今天汉藏之间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 (三)汉藏边界缓冲区内各少数民族群的共同点

在汉藏边界的缓冲区内,从北到南,现被国家正式认定的少数民族共同体依次是: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羌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这些民族有的相连成片,有的相距甚远,但都基本上处在青藏高原东北、东部边缘的河谷地带。与他们混居的主要有藏族、汉族、回族和蒙古族。这些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是:(1)新中国成立前,从来没有被统治集团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2)宗教信仰普遍,几乎都是全民族信教:要么信仰藏传佛教,要么信仰伊斯兰教,间或其他宗教;(3)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除羌族外,都与蒙古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4)形成时间基本上是从元代开始,明代基本形成;(5)全部居住和生活在藏族和汉族两大民族之间的缓冲区域;(6)民族形成的地缘单一性,即除这些地区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再形成与之相同的族群。

现在汉藏边界上的几个主要民族,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而确认的。如今,它们大多都有着相同的族源特征,即族源的多元性和争论性。多元性指的是这些民族的形成往往是在一



个主体民族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争论性指的是学术界对其中一些民族的确切族源到今天还存在不同的说法,甚至有着激烈的论争。但无论如何,这些民族演进和形成的大致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 (四)汉藏边界缓冲区对新族群的催生作用

如果简单梳理一下汉藏边界上这些民族的形成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由于汉藏边界的存在和汉藏民族互相的防守构想,造成了这一边界的缓冲区,而填补这一缓冲区的正是不同于双方的一些其他群体。蒙元时代,这种特征极其明显。蒙古族作为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在汉藏边界安排了一系列新的群体,成为形成汉藏边界新民族的主体。元代之后,尤其是明代前期开始,和硕特蒙古人进驻青藏高原,基本上驻牧于汉藏边界稍稍靠西的广大地区,尽管蒙古人的进入和藏族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但由于宗教的原因,两个民族之间没有发生本质的、大规模的冲突,反而形成一个联合体。自此开始,明清政权为防止青藏高原上藏蒙联合体的东侵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在汉藏边界进行边疆移民戍屯,逐渐形成大量汉族移居河湟地区,并逐步成为主体民族的格局。在诸如河湟地区,由于地理的原因,由于政治的原因,也许还有偶然的原因,从古至今,多种民族纷至沓来,众多族群繁衍生息,有些消失殆尽,有些存续至今,有些新近形成。如果把这一区域形象地用“民族走廊”来形容的话,“走廊”之意不仅仅意味着这一区域的民族之众多,也特指了这一区域内自古以来多种民族的繁衍、形成、消失的民族演进场景。

可见,在汉藏两个民族边界的缓冲区域里,一些明显迥异于汉族和藏族的具有其他文化特质的民族恰恰找到了生存的空间,逐渐成为这一缓冲区域的主人,从而也就形成了汉藏之间多民族分布的民族格局。藏汉边界上缓冲区域的始终存在,为新族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双边盈利”的条件。这些生存于汉藏边界缓冲区的新群体,在漫长的族群形成过程中,自然有着复杂和辛酸的曲折经历,但同时也是一个“双边盈利”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血统上的盈利性 从民族血统上来看,这些民族的先民虽然都有着和现在周边民族迥然不同的血缘和体质特征,但就现在的民族共同体来看,除他们各自的血缘和体制特征之外,其中融合了大量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族群的血缘和体制特

征(1980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者已经对裕固、土、撒拉、保安、东乡、羌六个民族进行了多项体质数据测量和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民族都与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有着密切的血缘和体质关系)。也就是说,这些民族的形成是融合了边界之间各民族的族群成分,在民族来源上,处于“双边盈利”的有利地位。

2. 文化上的“双边盈利”性 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受到边界两边的汉族、藏族、蒙古族的影响,吸收了各种优秀成分,也是一个“双边盈利”的局面。如裕固语、土语、撒拉语、保安语、东乡语中就有相当多的汉语、藏语以及蒙古语成分。就土族语而言,根据研究,其中汉语借词占13.92%,藏语借词占6.36%,其余为蒙古语(见《土汉对照词汇》,1982年)。就东乡语而言,汉语借词占44.5%,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词汇占5%,有少量藏语,其余为蒙古语(见《东乡语词汇》,布和等编,1959年)。可见,这些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是一个复合体,从边界两边吸收了不少的语言成分。在其他文化层次上,比如文字、部分节日习俗、丧葬习俗等方面,也兼具了边界两边的文化成分。

3. 经济上的“双边盈利”性 在从事的生产方式上,这六个民族都有一个特点,即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由于边界两边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对于这些民族而言,就具有了两者兼而有之的特点。当然,这也是由藏汉边界缓冲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谷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山地则是优良的牧场。同时,这一特点还尤其表现在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的经济特征上。由于西边是广大的藏族牧区,东边又是富饶的汉族农业区,处于中间边界地带的这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就成为汉藏之间贸易的中间人。到藏区收购畜产品贩卖到农业区,然后从汉地组织生活和生产用具再贩卖到广大藏区,这是一代代撒拉人、东乡人、保安人从事的最主要的商业活动,直至今日,依然如此。在汉藏之间,他们成了真正的“双边盈利”人。

### 三、结论和启示

任何边界,无论是地理边界、文化边界、政治边界、族群边界,在逻辑上是清晰分明的,但实际上绝不可能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切断边界两边族群的各种联系和交往。即使在今天严格的民族国家地域疆界的管理和控制下,边界之间的交流始终存在。边界是游弋的、变化的,却也是有一个中心

线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边界的钟摆”现象。无论如何,边界的空隙是存在的。从羌族到吐谷浑,再到藏族、藏蒙联合体,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的边界始终存在。但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缓冲区,它的形成是不同时期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冲突的直接结果。在这种冲突(可以是军事性的直接武装冲突,也可以是互防的“冷冲突”)的作用下,由于冲突的需要,新的群体不断进入这一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是说,汉藏边界上的冲突是导致现在这一地区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直接原因。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存在的弧形锋线,是藏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在这个边界的“钟摆边界”之内,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这种现象值得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去研究。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在研究汉藏之间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就必须站在一种宏观的高度去审视,而不是只看这些民族族源材料的片言只语。

值得强调的是,在具备形成族群边界缓冲区的地带,往往也是族群冲突的频发地,即往往是“文明冲突”的锋线。亨廷顿用“断层线”来分析这种现象,“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在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引发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sup>[6]</sup>“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万群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sup>[7]</sup>虽然亨廷顿极端地认识和放大了“断层线”之间群体的冲突特征,忽略了群体之间沟通与共荣可能的现实例证,但确实也指出了族群边界之间“断层线”冲突的一些常态,而这种冲突也是导致族群边界缓冲区产生的主要因素。

边界起初是由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但随着族群的发展,这种边界的束缚已经不再具有限制族群向外扩张的可能。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地理边界再一次成为划分族群边界的依据。但民族国

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政权实体,他的强盛、衰落乃至消亡必定影响到族群边界的划分。民族边界也因此往往出现一个游弋的地带,形成“钟摆边界”的缓冲区域。填补这一区域的群体往往受到边界两边民族的影响,吸收各种文化因子,融合周边民族的人群,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任何族群边界中都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只要有着一定的条件,新的文化就会产生,随之而起的往往是这种整合文化的持有者——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故而,族群边界缓冲区的存在是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 参考文献:

- [1][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 [2]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1.
- [3]后汉书,卷117,西羌传[M].
- [4]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47.
- [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28.
- [6][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83,284.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红 峰]